学習時報

STUDY TIMES

2016年8月15日 星期一 | 第906期 |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 网址: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37 代号:1-267

重要言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根本靠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靠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群众基础牢固扎实。要增强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要全面推进县乡村各级各领域党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组织体系更加严密、责任体系更加清晰、服务体系更加高效、保障体系更加有力。要多为群众排忧解难，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对广大基层干部，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心，在交任务、压担子的同时教方法、给条件，在有效约束的同时加强正向激励，让他们更有劲头、更有奔头。

坚守质量安全底线　提升质量供给水平

——国家质检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支树平答本报记者问

高层访谈

□ 本报实习记者 闫书华

质量安全监督是攻坚战持久战

记者：随着老百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对产品质量关注度不断提高，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我国产品质量安全形势，质检系统在质量安全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支树平：产品质量安全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有数据显示，我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从2001年的75.8%上升到2015年的91.1%，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从2002年的77.89提高到目前的83.34，这说明我国质量总体水平取得了明显提升。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作为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我国产品质量总体水平还不够高，部分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有相当比重的高档数控机床、集成电路、高端芯片、精密检测仪器等依赖进口。“十二五”时期，中国进入世界品牌500强的制造业品牌数量仅占2%。2015年出口工业品遭退运40274批、货值24.3亿美元，因质量问题遭退运的占58.7%。假冒伪劣屡打不绝，“十二五”时期，质检系统累计查处质量违法案件52.2万起、涉案货值245.2亿元。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质量工作面临的突出矛盾——相对落后的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供给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质量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

维护质量安全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质检部门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加强风险防范，聚集监管重点、集中监管力量，牢牢守住质量安全底线。上半年，围绕消费品安全，组织开展汽车配件等5个专项的“利剑行动”，共召回缺陷汽车599.88万辆，缺陷消费品110万件。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3952批次，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9.7%，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查处各类质量违法案件1.4万起、货值10.7亿元。

还要引起注意的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门安全形势日益复杂。我国特种设备数量激增，设备老龄化现象普遍，电梯、油气输送管道等特种设备事故故障时有发生。上半年，我们围绕国门安全，首次组建防疫工作组到安哥拉开展黄热病疫情防控，驻安中国同胞未再受感染，对中国卫生检疫工作模式创新具有里程碑意义。全国口岸发现传染病例、截获外来有害生物、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化妆品和不合格危险化学品批次都有不小增幅。围绕特种设备安全，深入开展电梯安全攻坚战和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攻坚整改战，各类特种设备事故和相关事故同比下降2.6%。

推动企业发挥质量主体作用

记者：维护产品质量安全，既需要政府监管得力，也需要企业切实履责。如何更好地发挥企业在提升产品质量方面的作用？

支树平：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提升质量的主体。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也涌现出一批重质量、守诚信的优秀企业。同样的道理，质量出问题，根子也在企业。出了质量问题，企业无路可退。这些年因质量和管理问题被媒体曝光，甚至遭到市场淘汰的企业，也不在少数。即使像当年三鹿集团这样的国内乳业巨头，像丰田汽车这样的跨国大公司，由于忽视质量问题也要付出惨重代价。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推动企业发挥质量主体作用。一要将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清理各种市场障碍，为质量提升松绑解缚，让优质产品畅行无阻，激发企业质量创新内生动力。二要监督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推广质量安全首负责任制，切实履行质量担保责任及缺陷产品召回等法定义务。三要提高企业质量创新能力，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四要发挥优势企业引领作用，推动中央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成为国际标准的主要参与者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实施主体。五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产品设计、生产、流通、销售和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哪个环节发生质量问题，就由哪个环节的生产经营者负第一责任。

今年上半年，质检总局推进质量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归集20多万家企业110多万条质量信用信息，对18万家进出口企业开展信用管理，新公布信用管理“红黑名单”进出口企业280家。全面推行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3.4万家企业公开11万项标准，对1.1万项强制性标准及计划项目开展了整合精简。这些监管创新，为促进推动企业履行质量主体责任发挥了积极作用。

惩罚激励并举推进质量发展

记者：有观点认为，我国产品质量问题时有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惩罚力度不够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支树平：我国对产品质量问题有完善的惩罚制度，囊括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三个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制定修订的法律法规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惩罚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民事责任方面，侵权责任法专章对产品责任进行规定；在行政责任方面，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对严重产品质量问题的惩罚金额增加至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的3倍、10倍甚至30倍；在刑事责任方面，我国刑法修正案专门一节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最高至死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要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加大惩罚力度的重要举措。目前，我们正在对如何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加大惩罚力度只是促进产品质量提升的一种手段，还需要完善产品质量激励制度。我国现行的质量法律法规重在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兜住底线，但在质量发展和质量促进方面仍是空白。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制定质量促进法，质量促进法的定位是促进型质量立法，旨在通过建立多角度的质量激励措施，推进质量发展，把提升质量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内生动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安全需求，建立完善中国特色质量法治体系。

打出组合拳促进质量品牌提升

记者：近年来我国出现居民出境消费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产品质量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如何综合运用质检职能，加快质量供给创新，促进质量品牌提升？

支树平：质量供给创新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近年来，我国出现居民出境消费热，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国内质量和品牌有效供给不足。抓好质量品牌提升，对改善质量供给、促进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和迫切。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质量品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国家质检总局作为国家质量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通过评选中国质量奖、创建“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开展品牌价值评价等措施，研究品牌、培育品牌、保护品牌、宣传品牌。这些年，质量品牌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体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还有差距。

今年全国质检工作会议上，质检总局对综合运用质检职能、集中力量抓质量品牌提升进行了系统部署，2016年质检八项重点工作任务中首要的就是质量品牌提升行动。我们重点从提升消费品质量、出口商品质量、服务业质量和加强品牌建设四个方面予以推进，综合运用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抽查、执法打假、舆论宣传等手段，打出“组合拳”，为质量品牌提升提供支撑和服务。

通过半年的集中行动，电饭煲、智能马桶盖等10种重点消费品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相继开展，针对17种消费品组织实施了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消费品、出口商品、服务业、地理标志产品等四大领域质量品牌提升取得阶段性成果，输非商品、输中东商品不合格率较去年明显下降。质检总局还与发展改革委共同研究制定并报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明确将品牌建设工作上升到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升级的战略地位。（下转4版）

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 胡雪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对此，我们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在背景、本质、内容及政策含义，特别是背后蕴含的思维方法方面存在的本质区别，从而在比较分析中加强鉴别、深化认识、把握实质。

背景：成长接续而不是滞胀泥潭

西方供给学派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滑甚至负增长、就业恶化与通货膨胀加剧等长期并存的现象，即“滞胀”。在此形势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失效，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供给学派提出减税、削减政府开支、限制货币发行量等政策建议，被1981-1989年在任的美国总统里根采用，形成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

供给学派或里根经济学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背景条件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很不相同。**首先，在经济增长方面。**美国经济增长率在1970-1982年间下降到2.5%，与1960年代的年均4.5%相比，虽然只下降了2个百分点，但下降幅度高达45%，尤其是在1974、1975和1980、1982年四年出现了负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逐步下滑至2015年的6.9%，但与西方“滞胀”时期的动辄负增长有着本质区别，而且与世界主要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比，仍处于较快的增长区间，正处于“中高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第二，在就业方面。**美国失业率从1970年初的4%逐步上升到1983年前后的10%以上，是“二战”后的最高水平。我国2008年以来历年城镇新增就业均在1000万人以上，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1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仅4%，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在5.1%左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第三，在物价方面。**美国的通货膨胀贯穿于整个1970年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1974、1975和1979-1981年等五年间都超过了10%，最高在1980年达到14%。我国自2012年以来CPI基本维持在3%或以下水平，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自2012年2月以来连续负增长，呈现出的景象与通货膨胀明显不同。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倒逼下的必然选择。这些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首先是结构性的供给过剩。**最近10多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供给能力是面向外需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产能。比如，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1年仅2.1%，到2007年攀升至8.7%，2014年回落到2.7%；货物出口与最终消费的比例，也是在2007年达到历史性高点68.6%，而2001和2014年分别为32%和43.7%。这种升与降的过程，实质是要素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的过程，大量资源围绕出口进行布局，而当前国际市场增长放缓，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依靠内需无法充分消化这些产能，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就凸显了出来。**其次是结构性的需求分化。**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13亿多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与此同时，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品质要求明显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并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转换，需求层次趋于细化、个性化。**第三是结构性的供需不匹配。**消费者的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或者是在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在质量、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方面跟不上，导致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或者是在诸如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仍然存在供给不足，原有的供给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归根到底，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背景是随着需求结构的明显变化，供给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不断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下转4版）

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 本报特约评论员　刘建飞

十八大以来，针对中美关系的新特征——由普通大国同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转型为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战略思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三年多的实践表明，中国的对美战略是成功的，双边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虽然局部摩擦、冲突此起彼伏，但总体关系还是在“不冲突不对抗”的大框架内，并且在许多领域继续深化合作共赢。中国对美战略的最重要前提就是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准确研判。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虽然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但是不愿意同中国全面对抗。同中国对抗的结局肯定是两败俱伤，美国的霸权地位会提早终结。如果同中国进行合作，还有助于美国增强实力，实现“体面地衰落”。这也正是美国在实施“巧实力外交”，挑动一些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同时，也一直同中国保持战略沟通并继续开展经贸、全球治理等方面合作的原因所在。

然而，毕竟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将持续下去，发展中美关系任重道远。就目前来看，要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需要在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上三管齐下，同时着力。

首先要着力增进互信。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存有战略猜疑是天然的事情，中国从提出和平崛起到倡导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在努力化解美国的战略猜疑。然而，这种化解工作是十分艰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认为国强必霸，怀疑社会主义中国会超越西方列强。对此，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发展的目标，就是让13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也无意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规则。”

其次是深化合作。国家间的合作，范围越广、程度越深，就越有利于双边关系稳定。中美关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可以合作、需要合作的地方很多。中美双方要积极拓展经贸投资等双边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等多边领域及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使务实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习近平还指明了近期两国合作的重点方向：“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该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向世界传递信心，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最后是管控分歧。对中美两个大国来说，管控分歧尤为重要，但又尤为不易。历史上因局部利益分歧激化而导致国家间冲突、战争，从而使整体利益完全丧失的事例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彼此的核心利益缺乏尊重，尤其是实力较强的一方，总是摆脱不了强权心态。所以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中美双方“要有效管控分歧，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管控分歧联系在一起，可谓是抓住了症结。

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对稳定发展双边关系极为重要。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进行过多次会晤、深谈，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了不可替代的正能量。习近平主席向赖斯表达了再次会晤奥巴马的愿望，也期待习奥杭州会能够“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两国关系未来继续稳定发展明确方向、打下基础”。

总的来看，中美之间的大博弈虽然会继续下去，而且有时还会很激烈，但是，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有望推进。

时势专论